

三十年來東西冷戰之演變

·上·

鄧公玄

一 前言

自二次大戰以後，東西冷戰即陸續展開，最初祇表現於歐洲與中東，其後蔓延及於整個地球，使吾人之地球分爲兩極世界。但自一九六二年古巴事件以後，因東西雙方皆內部分裂，冷戰形勢大爲改觀，逐漸形成爲美、蘇、匪三角鬥爭或多角混戰之新形態。迨至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森提出所謂「以談判替代對抗的口號」以來，於是產生所謂「低溫」(Détente)之新現象。因此，西方人士認爲「冷戰」業已過去，一味致力於「和解」，不論報章雜誌乃至政府官文書皆竭力避免「冷戰」字樣。但共產集團方面雖首先提出所謂「和平共存」之口號，而事實上乃是利用和平空氣，以瓦解西方人士之鬥志，逐漸達到赤化世界，埋葬資本國家之野心。但自越南三邦淪陷以後，美國乃開始懷疑「和解」之價值，而由蘇俄逃亡之索忍尼辛更警告「和解」爲共產黨之陷阱。即一向追隨尼克森路線之福特，亦聲明今後不再使用「低溫」一詞，而改用「經由實力達到和平」之新口號。福特雖否認「冷戰」之恢復，但「冷戰」之繼續存在，且勢將升高，實屬無可諱言之事實。

作者認爲「冷戰」二字實爲戰後國際政治的中心線索，吾人爲欲了解當前之國際局勢以及世界未來之發展，均不能不了解「冷戰」之來龍去脈，所以特撰「三十年來東西冷戰之演變」一文，藉作留心國際問題者之參考。

二 二次大戰後冷戰發生之主要原因

二次大戰後，「冷戰」即立刻出現，雖然在大戰尚在進行中，即早已醞釀。冷戰發生後，使我們的地球逐漸形成爲「兩極世界」，此種情形實爲有史以來所未嘗有者。爲什麼呢？因爲在二次大戰以前，所謂帝國主義者之侵略行爲，往往是純粹的權力主義，一個強國祇要有足夠的武力，便可以併人之土，滅人之國，不必假借任何理論的口號以作掩飾。但是二次大戰以後，由於蘇俄成爲世界超強之一，遂欲乘機赤化世界，以實現其所謂無國界、無階級的共產主義世界之迷夢。其第一步之工作爲豎起所謂「共產鐵幕」，消極的目的在使共產國家與自由世界完全隔絕，以免民主自由思想侵入共產國家以內，而其積極目的，則在逐漸伸張其勢力於鐵幕以外，或以武力壓迫鄰邦，或以統戰方法瓦解非共產國家，以期消滅資本國家，達成世界革命之目的。這就是共產鐵幕之所以建立，而逐漸造成兩極世界之由來。

至於所謂「冷戰」，乃西方國家，尤其美國爲針對蘇俄之野心，逐步提出對抗蘇俄擴張之措施，因其着重於政治、經濟、宣傳、情報與思想上的鬥爭，故稱之爲「冷戰」，以別於疆場上的「熱戰」而言也。三十餘年來，雖然也曾引起小規模的地方性的熱戰，如韓戰、越戰、非洲及中東戰爭，然而全面性與直接性的熱戰，則雙方盡力避免，蓋因蘇俄亦於戰後擁有原子與核子武器，造成所謂核子僵持的局面，雙方皆不敢冒大規模毀滅性的核戰危險故耳。

所以二次大戰以來，「冷戰」之所以發生，雖由美、蘇兩超強國家的權力爭霸，而因其具有所謂意識形態的特質，故與舊式帝國主義純權力主義之戰爭不可並爲一談。質言之，「冷戰」之主要因素爲共產主義與非共產主義之不並容性，此種不並容性雖早爲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所設定，但在二次

進政策之所犧牲。

蘇俄南進、西進均不能得逞，而獨能得志於東進者，實因美國當時眼光短淺，採取「歐洲第一」的錯誤觀念，對於遠東之危機完全忽視，不但忽視，且派馬歇爾將軍壓迫我政府與中共匪幫組織聯合政府，美國雖非有意害我中華民國，而結果則做了蘇俄與共匪的幫兇。至於在歐洲方面，美國則積極從事於防堵，如一九四七年八月宣佈之馬歇爾計劃；一九四八年八月，將美、英、法三佔領區組成西德聯邦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四月，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設置北約聯軍統帥等，皆為反共之重要措施。尤其前面所述對於蘇俄封鎖柏林時所採取反封鎖的空運政策，更能發揮「冷戰」的効力。但是美國與西方國家的「歐洲第一」政策，適成為蘇俄放手侵略遠東的有利條件，對於「冷戰」的成敗造成無可補救的損害。

由杜魯門主義以來的「圍堵政策」雖非上策，然而如果一開始即能照顧全局，不僅注意歐洲，而同時適用於亞洲一般地區，尤其對於中國大陸方面而能同樣警覺，當中共在大陸進行叛亂時，而不為共黨同路人之謬言所惑，以全力幫助我政府戡平叛逆，一如美國對希臘共黨者然，則中國大陸斷不致為共匪所竊據，中國大陸而不淪陷，則蘇俄侵略遠東之野心，亦當如其西進、南進之企圖早經遏阻。吾人試思之，倘非中國大陸之赤化，爾後所發生韓戰、越戰又有發生之餘地乎？韓戰與越戰如果不會發生，則美國豈非至今仍為執世界牛耳之唯一領導國家乎？

四 圍堵政策之普遍實施與西風之壓倒東風

當蘇俄與中共匪幫攜手赤化了中國大陸，我政府於一九四九年退守臺、澎、金、馬之時，美國政府對此猶無動於衷，且為洗刷其責任起見，發表白皮書，謂中國大陸之淪陷，乃中國政府貪污無能之結果，與美國政策毫無關係。而最奇怪者，厥為美國國務院有關太平洋防線之聲明。國務院聲明：「美國在太平洋之防線，係北起阿拉斯加，經阿留申羣島，日本羣島，琉球羣島，而南達菲律賓羣島。」

美國的白皮書有兩項用意，其一、為表示美國無意繼續支持中華民國，亦無意反對毛共偽政權。其有關太平洋防線之聲明，則似在暗示美國不再干涉亞洲大陸問題，同時亦暗示毛共勿再向外擴張侵略，不論前者或後者，均表示美國將承認既成事實之意向。

不料此兩項文件遂造成無窮之後來惡果，尤其後者，其帶來之禍害至今猶滋深未已。蓋美國既正式聲明整個亞洲大陸及臺澎既均屬美國在太平洋的防線以外，即不啻有意將南韓、臺澎，乃至整個東南亞悉予捐棄，此乃極其彰明的事實。我們知道共產黨赤化世界的侵略野心是無孔不入的，諺所謂人棄則我取之，共產黨豈有不勃然心動乎？

韓戰爆發與美國之變卦——由於美國既明白聲明韓國在其太平洋防線之外，所以蘇俄即嗾使北韓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戰略，突然進攻南韓，很快就越過北緯三十八度防線，掃蕩漢城，長驅南下，以為在兩星期內即可佔領整個朝鮮半島，囊括於鐵幕之內。不料美總統杜魯門聞之，忽然大怒，立刻下令駐韓美軍參加作戰，並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以聯合國名義，大舉與師，承擔全部作戰之責，於是韓國戰爭拖延達數年之久，始得停火。這是蘇俄及北韓所不及料，而美國一般人也不會預料得到的。由於美國之突然參加韓戰，我們再度可以證明美國對抗蘇俄與反共政策實乏遠大之全盤計劃，同時也不難了解美國何以在韓戰中付出極大代價而終不能獲得其應有報酬之故了。

為什麼美國既聲明韓國在其防線以外，而又忽然變卦呢？論者多謂南韓係美國卵翼而立之國家，故美國不能不予以支持，頗有實逼處此之勢。但我們認為此非真正之理由，真正之理由乃在杜魯門以為蘇俄之野心不僅在攫取南韓，而在進攻日本羣島，所以不得不為防衛美國太平洋防線重點而作戰。其次，則杜魯門或以為蘇俄勢將挺身應戰，如此，美國可對蘇俄予以迎頭痛擊。不料史大林見風轉舵，立刻龜縮，反誘導共匪以「志願軍」方式作替死鬼，並採用人海戰術以困擾美軍。美國當局原以為可與蘇俄攤牌，今蘇俄既不敢出頭，而以下驕對抗上驕之詭謀應付美國，使美國找不到真正之對手，自不免意興闌珊，認為係一場錯誤的戰爭，而亟欲草草收場。當時麥克阿瑟將軍有意藉此進攻鴨綠江以北，直搗滿洲，同時亦擬支援我國反攻大陸，以消滅共匪偽政權，然而均為杜魯門所否決，甚至麥帥亦因而遭到免職之處分。

我們仔細研究起來，殆因美國不以共匪為對手，故不得不使韓戰局部化而速求了結。所以當艾森豪於一九五二年競選總統時，即以結束韓戰為口號，亦以此而獲壓倒性的勝利，其義亦可知之矣。

不論如何，韓戰之發生，顯然出於雙方估計之錯誤，而韓戰之草草結束，則更是由於美國政策之錯誤。蘇俄因為相信美國將放棄南韓，故貿然嗾使北韓併吞南韓，美國則以為蘇俄蓄謀進攻日本，不得不挺身應戰，故雙方皆係出於估計錯誤，殆為不爭之事實。可惜美國因為不能以蘇俄為對手，遂力求韓戰之局部化而草草了結，倘能將錯就錯，而毅然採取麥帥之主張，則雖不能直接打擊蘇俄，至少亦可解放北韓與中國大陸，使蘇俄失却其在亞洲的影響力。不幸美國祇求保持北緯三十八度以南之舊防線，而即戛然中止。以致不但未能解決韓國問題，且因此使越南戰爭且隨而逐步升高，卒使美國再度捲入亞洲戰爭，更令美國焦頭爛額，而仍始終不悔，抑可哀矣。

圍堵政策之合龍與赤焰之暫斂——美國對韓戰雖付出極大代價，而未能達到應有之勝利，固屬可惜，但因韓戰而促成圍堵政策之合龍，則是顯然的事實。當杜勒斯為艾森豪助選時，彼曾主張揚棄「圍堵政策」，改採「解放政策」(Policy of Liberation)祇是艾森豪上台以後，杜氏雖出任國務卿，而並未能貫徹其主張。蓋美國人在韓國無心戀戰，而艾森豪又無世界政治遠謀，一心祇求韓戰停火。加以一九五三年春，史大林突然死亡，俄人因羣龍無首，為和緩西方國家計，乃提出「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istence)之口號，美國朝野人士信以為真，遂望風轉舵，亦開始作和平共存之打算，而一九五四年七月，卒在日內瓦簽定韓戰與越戰之停火協定，朝野人士無不躊躇滿志，竟認為莫大之勝利。

然而杜勒斯任國務卿以後，因環境關係雖未能致力於解放政策，但對圍堵共產侵略之政策，則頗有建樹，舉其著者，如與太平洋地區之澳洲、紐西蘭、菲律賓、中、日、韓等國分別簽雙邊或多邊共同防衛條約，而東南亞公約組織，以及中東之中央公約組織亦先後成立。於是西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起，聯合中央公約組織，東南亞公約組織，而與太平洋地區之雙邊及多邊共同防衛條約相銜，其間除印度半島尚游移不決外，所有沿共產集團之鐵幕邊緣，皆已完成一大包圍圈。質言之，即美國的圍堵陣線，至是大致可謂業已合龍了。除此而外，美國此時，復在鐵幕周邊先後建立百餘所陸海空軍事

基地，隨時警戒，以應付共黨之可能侵略行動。

所以在此時期，蘇俄與其附庸，包括共匪在內，皆不敢越雷池之一步。西方人士對此種情形當然深感滿意，以為從此可以制服共產集團之野心，且久之，不難令其自行崩潰，獲得「冷戰」之全面勝利。殊不知美國的圍堵措施純屬消極的，雖能使蘇俄及其附庸暫時斂跡，而不足以阻止其從事於核子武器與火箭飛彈之加緊發展，此則美國「當機不斷，反受其亂」之又一鐵證也。

五 洲際飛彈出世與蘇俄之反擊

由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發生至圍堵陣線之完成，美國與西方人士正在額手稱慶，蘇俄忽於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宣佈發射地球衛星史普尼第一(Sputnik I)，十一月三日，又發射史普尼第二(Sputnik II)。赫魯雪夫同時宣佈蘇俄已擁有洲際飛彈，足以攜帶核子彈頭，摧毀美國及西方任何目標。

此一事件使美國與自由世界不啻晴天之霹靂，蓋美國與西方人士向來輕視蘇俄之科技成就，今聞其能發射地球衛星，擁有洲際飛彈，足以遠射美洲，命中國城市與軍事基地，其惶恐之情，自不足怪。我們知道美國年來在共產鐵幕邊緣建立數以百計的軍事基地，其目的不僅在防堵共產赤流之向外擴張，而尤在保障美國本土不受戰禍之災殃。今蘇俄有由莫斯科按電鈕而遠達華盛頓之飛彈，則美國本土之安全完全失却保障，而美國辛苦經營之軍事基地雖未全失價值，然已不足以退阻其超越基地之攻擊矣。此不獨證明美國戰略之錯誤，且亦證明美國軍事科技亦犯極大之錯誤，無怪此時美國朝野人士為之戰戰兢兢，寢食難安也。

赫魯雪夫深知美國及西方人士之恐懼不安，所以自時厥後，遂立刻收起笑臉，對美國及西方發動反擊之攻勢。於是要求西方國家同意召開高峯會議，解決東西之重大爭執。一九五八年春間，赫魯雪夫又向西方國家提出類似哀的美敦書的宣言，主張將柏林成為自由市，要求西方駐軍應一律撤除。如西方在半年內不依其條件答復，則當不顧西方的反對，單獨與東德簽定和平條約，將柏林交由東德處理。

當時西歐各國皆忙於蘇俄飛彈恐嚇，大都主張接受蘇俄要求，以免遭受毀滅。美國輿論亦因恐本土遭受飛彈襲擊，大多主張接受蘇俄之要求。惟國務卿杜勒斯表示反對，仍堅持其既定政策，因而被美國及西方人士指為戰爭邊緣政策，深受抨擊。杜勒斯為和緩內外壓力起見，遂不得不採取拖延策略，表示接受蘇俄召開高峯會議之意見，惟在高峯會議之前，必須召開外長會議，先決定一切重要問題，以免高峯會議之失敗，而肇核子戰爭之危機。於是美、蘇、英、法屢次召開外長會議而終無結果，使東西緊張形勢與日加深。在此時期，美國為預防蘇俄之飛彈襲擊起見，曾下令各基地之B52戰略轟炸機，每日二十四小時，不斷輪班升空，攜帶核子彈頭，準備隨時飛向莫斯科，執行報復戰略之使命。所以赫魯雪夫雖藉飛彈為恐嚇之工具，而亦未敢貿然冒險，以免遭受美國戰略飛機之報復。

迄至一九五八年一月，美國亦發射了第一枚地球衛星探險家第一號（Explorer I），雖在技術上尚落於蘇俄之後，然差距則已減少，而美國又以全力從事於太空科學之邁進，自不難趕上甚至超越蘇俄，此亦為蘇俄不敢發射洲際飛彈之另一重要原因，因此，蘇俄利用飛彈向美國及西方之勒索政策，既不能達到壓服之目的，亦無法長久維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春，杜勒斯病逝，美國外交政策乃由艾森豪親自主持。是年夏，艾森豪派副總統尼克森訪蘇，攜艾氏親函邀請赫魯雪夫訪美，赫魔即望風轉舵，欣然接受。是時各國外長在日內瓦會議，空氣甚為緊張，因赫魔接受邀請，立刻和緩，而赫魔原定解決柏林問題之限期，亦自動宣佈予以取消，雨過天青，國際冷戰遂轉入一個新的階段。

六 赫魯雪夫訪美帶來短期和緩空氣

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巴斯蒂他（Bastita）政府倒台，共產黨徒加斯楚（F. Castro）遂在西半球建立第一個共產政權，美國雖深感惶惑，而竟莫可如何。是年九月赫魯雪夫應邀訪美，不啻以勝利者之姿態，率同大批嘍囉前往，抵美後，則高唱和平共存濫調，同時又在聯大發表「全面澈底裁軍計劃」的演說，雖聽者多知其為謊言，但博得不少之喝采。其後，赫魔漫遊美國各大城市，到處以笑臉迎人，不但左派人士為其叫好，即反共人士亦為之

改觀。所謂大衛營精神——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艾森豪與赫魔在大衛營舉行會談，因產生所謂「大衛營精神」。據艾、赫發表之公報，其要點如次：

一、和平競存——雙方同意一切未決之國際問題，不應藉武力而應循談判方式以求解決。

二、高峯會議——赫魯雪夫同意撤除對柏林問題之時限，艾森豪同意參加高峯會議。

三、柏林地位——俄主柏林中立化，美表示需要取得有關地區人民之同意。

四、對德和約——俄主與東德單獨簽訂和約，美表示必須俄能尊重西方盟國在東德之條約權利與地位。

（以上三、四兩項，雙方同意西方與蘇俄恢復會議）

五、美俄貿易——俄允就償還租借法案貸款，恢復談判（共二十九億圓，已還八億），美則允許放寬對俄貿易限制，進行會商。

六、文化交流——美蘇文化交流協定，年底屆滿，雙方同意延長並擴大交換。

七、美匪關係——美表示放棄對自由中國的支持，亦無意攻擊共匪，但盼共匪釋放美俘，並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俄促美國承認中共偽政權之存在，允其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會議，關於釋放美俘一節，允代轉達。

八、裁軍問題——赫魔叫囂全面裁軍，主張北約與華沙公約組織締互不侵犯條約，並撤除駐外軍隊及海外基地。美堅持裁軍必須配合有效視察與管制，駐軍及基地係防衛性質，應先消弭侵略威脅，始能予以撤除。

九、艾氏允訪蘇俄——赫魔建議艾森豪展期至明春訪蘇，艾氏同意，確期由外交途徑商訂之。

上述九項所謂「大衛營精神」，實際不過是「和平共存」的一種空言，但西方人士則寄予莫大之殷望，以為東西冷戰可由此解凍，和平希望遂瀰漫一時。

U2事件與巴黎高峯會議之流產——由於大衛營精神之幻想，使美國及西方人士沈醉於和平空氣之中，不料當艾森豪與高采烈準備參加巴黎會議之前夕，即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美國的U2偵察機在蘇俄上空忽被擊落，此

事發生後，赫魔即藉此大肆咆哮，誣指美國存心破壞和解。當艾森豪抵達巴黎參加五月十六日之高峯會議時，赫魔即當面要求美國向蘇俄正式道歉，艾森豪雖未允道歉，然亦惟忍氣吞聲而不敢予以反擊，而美、蘇、英、法四國高峯會議卒告流產。高峯會議既臨時破裂，美蘇關係遂立刻恢復劍拔弩張之勢，而所謂大衛營精神亦烟消雲散矣。

一九六〇年係美國大選之年，艾、赫交惡之形勢既成，於是赫魔乃故意表示不願再與共和黨政府打交道，同時為影響美國大選起見，竟不經美政府邀請，而乘聯大開會之期，再訪美國，同時並邀約東歐附庸國及中立國家之首腦，浩浩蕩蕩，同集紐約。美國明知赫魔來意不善，不但未予禮遇，且限制其行動於紐約曼哈頓島上，不得任意東奔西闖。赫魔要求與艾森豪見面，亦嚴詞拒絕。於是赫魔惟有在其寓所向紐約民衆大放狂言，並在聯大席上脫鞋拍桌，大鬧會場，以洩其無名之火。因此，美、蘇關係益陷低潮，而赫魔之猙獰面目，則愈為世人所認識。

甘迺迪當選未能打開美、蘇僵局——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美國大選之結果，民主黨甘迺迪擊敗尼克森當選為總統，甘氏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之元首，赫魯雪夫首先馳電致賀，並於甘氏就職後不久，即釋放兩名美俘作為見面禮，其有意與美國示好，顯而易見，甘迺迪亦以為美、蘇關係不難好轉。但一九六一年四月，甘氏輕舉妄動，主持古巴流亡軍進攻古巴之冒險，結果完全失敗，造成所謂豬灣事件之笑柄。於是赫魯雪夫又立刻收斂笑容，轉而予甘氏以無情之抨擊，美、蘇關係遂重回緊張之局面。是年六月，甘迺迪與赫魔在維也納舉行首次會談，經過兩日接觸，甘氏方認清赫魔之真面目，結果懷着失望而陰沉的心情繳羽而歸。

甘迺迪由維也納回美後，即發表告美國國民書，一改其過去樂觀而天真的想法，深知與蘇俄打交道非空言和解所能有效，於是決意一面加強核子武器，一面恢復傳統兵力，尤其對於太空競賽，主張必須全力以赴，否則，不足以對抗蘇俄。

由於美國態度如此，所以是年八月三十日，蘇俄即宣佈恢復空中核子試爆，自九月一日起，連續不斷進行各級核子彈頭之試爆。同時聯大開會時，因秘書長哈馬紹逝世，蘇俄乃提出所謂「三頭馬車」的要求，期使聯合國陷於完全癱瘓。因此「冷戰」再度出現高潮，而所謂中立或不結盟主義亦更趨

抬頭，正當蘇俄進行大規模空中試爆之日，亦即不結盟國家集合於南斯拉夫首都之時。

蘇俄既大規模進行空中試爆，美國自不甘示弱，所以一九六二年四月，亦宣佈在太平洋進行三十六次之空中試爆，種類由一千公噸級的小型核彈至十五米加頓級（相當於一千五百萬噸炸藥的威力）的巨型核彈不等。當美國進行核子競賽時，蘇俄復聲明將再作競賽之舉，然實則不過無可奈何之哀鳴而已。

美、蘇雙方此時之所以竭力從事於核子競賽者，實因美蘇飛彈差距業已趕上，甚至已有超越蘇俄之勢，故赫魔向美國敲詐之時機已過，不得不爾也。

七 古巴事件與東西陣線內部之分裂

在一九六二年夏秋之交，蘇俄雖曾再度挑起柏林問題的新威脅，但一般現象殊屬平靜，而是年七月間，蘇俄與十四國簽定寮國問題的和平協定，更表示雙方之安定。然而此種表面的平靜，正是醞釀新風暴的沉寂，因為美蘇飛彈差距漸已消除，而核武器方面，則因美國在太平洋試爆以後，蘇俄仍居劣勢，對赫魯雪夫而言，實為莫大的憂慮。

因此，赫魯雪夫不但失却向美國及西方訛詐的本錢，且有捉襟見肘之勢。赫魔為挽救其頹勢起見，乃異想天開，竟欲以偷天換日的手法，決定在美國大門前的古巴建立飛彈基地，把許多攻擊性的武器暗中運往，以為此項企圖一旦實現，則可以向美國提出攤牌的條件，迫使美國屈服。

但是黑魔此項陰謀不久即為美國察覺，迨至是年十月中旬，美國以U2飛機偵察古巴上空，結果攝得許多照片，證實其事，甘迺迪乃立刻召開安全會議，討論對策，結果甘氏採取比較中庸之對策，即是以不惜一戰的姿態，實行封鎖古巴（實際是採取檢疫方式而非真正封鎖）並致電蘇俄立刻撤除其飛彈基地的設施及一切攻擊性武器，如不允所請，則正式攤牌。在甘氏宣佈此項決策之前，即已下令動員陸、海、空三軍，至十月二十二日，突然正式宣佈，使全世界人士莫不震驚，而赫魯雪夫之手足失措，更可想而知。

在理論上，蘇俄可在戰爭與屈服之間加以選擇，但事實上，蘇俄實無選

擇之餘地，蓋蘇俄原為投機而冒險在古巴建立飛彈基地，今基地未成，安能冒險而與美國攤牌？所以赫魯雪夫在惶惑之中，惟有靦顏向美國投降之一途。可是赫魔却在投降之時，下了一腳極其陰狠的棋，那就是要求美國允許不以武力進攻古巴為條件，即自動撤除基地設施及一切攻擊性的武器。倘當時甘迺迪不為所動，赫魔仍當忍辱屈膝，可惜甘氏竟輕易答應，以致未能乘機解決古巴問題，卒致遺患無窮。

雖然如此，這是蘇俄第一次正式向美國投降，也因為蘇俄公開向美國投降，所以蘇俄外強中乾的實情，也就完全暴露於天下。蘇俄外強中乾的實情既完全證實，此不但影響到蘇俄本身的威望，且亦間接影響到美國的地位。我們可以說由於古巴事件之故，不獨使東西冷戰為之改觀，且使「兩極世界」亦逐漸變質。質言之，自冷戰發生以來，這是一個空前的轉變關鍵，其理由我們當於下分析之。

兩極世界的破裂——古巴事件的直接影響，固有關於美、蘇威望之升降，而其間接的影響，則為兩極世界的破裂。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前，東西冷戰，時起時伏，有時為東風壓倒西風，有時則西風壓倒東風，除有所謂中立或不結盟集團之投機取巧者外，整個世界不啻分為美、蘇兩大集團，大有不歸於楊即歸於墨之勢。然而古巴事件之後，則美、蘇兩超強的領導地位均為之動搖，於是東西兩大壁壘皆發生自行分化的現象，而所謂「冷戰」也者，也不復限於東西兩大壁壘之間，東方有東方內部的冷戰，西方有西方內部的冷戰，陣線混亂，已難以究詰了。我們再細究之，則知古巴事件至少產生下述之影響：

① 證明蘇俄實無足夠力量與美國攤牌，因此蘇俄威勢立刻下降，同時也使自由國家，尤其西歐國家減輕了恐蘇心理。

② 古巴卡斯特遭此打擊後，固失去威脅美國的條件，但反而獲得美國不以武力進攻的承諾，可以放膽向中南美滲透。

③ 美國門羅主義再度獲得新生命，因蘇俄被逐出於加勒比海後，拉丁美洲亦恢復對美的信賴。

④ 由古巴事件證明蘇俄不敢與美國作戰，故核子戰爭之危險與恐懼無形消逝。

⑤ 由蘇俄公然向美屈膝，使中共匪幫對蘇俄增加了抗拒的勇氣，因此共

匪乘機發動印邊戰爭，蘇俄則反而為印度撐腰。於是匪俄衝突達於表面化與尖銳化。

⑥ 在自由國家，尤其西歐各國方面，鑑於蘇俄之外強中乾，深知其無力發動西進之侵略，因而對美國核子保護之要求，亦大為降低，故其對外政策不必以美國之馬首是瞻，而轉而致力於本身利益之考慮。

⑦ 由於上述各種因素之影響，遂使東西冷戰之形勢趨於錯綜複雜，於是所謂兩極化的世界形成為多極化的新形態，蓋東西雙方內部均自行分化也。

甘迺迪大計劃與戴高樂大計劃的衝突——美國在古巴事件中贏得了一次勝利，其威望之立刻升高，乃屬自然現象，而年輕自負的甘迺迪之趾高氣揚，亦為無可避免之事實。所以甘迺迪不久即提出其大計劃，以期增加美國對歐洲之影響。甘氏欲使美國與西歐結為一個「大西洋社團」(Atlantic Community)，其內容分為兩大部分：(一)政治與經濟部分，首先為使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其次為組成一個包括英國在內的「聯合歐洲」，然後美國與「聯合歐洲」組成一個所謂「具體的大西洋社團」。(二)軍事戰略部分，由美國供給大西洋同盟一個中央控制的核子嚇阻武力，此中央控制意即美國控制。由此可見甘迺迪大計劃須有兩個大前提：(一)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二)為由美國領導建立北約的共同核子部隊。有前者，然後美國可透過英國的關係，才能使用美國在經濟上與西歐打成一片；有後者，美國才能由控制核子彈頭而成為美歐軍事力量的總司令。有了兩者，然後美國才能使西歐成爲一個統一的整體，而美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才能與其作為同等的伙伴，而形成爲對抗共產侵略的「大西洋社團」。甘氏此種計劃雖然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然而在體上乃是為自由世界共同利益而着想，值得我們予以讚揚。

但是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者，若干西歐國家，尤其法國戴高樂(戴氏東山再起不久)眼見此時情勢，一方面認定蘇俄無力發動西侵戰爭，一方面不甘受美國長期領導，以為最好趁此時機建立由法國領導的第三勢力。戴氏此種計劃，亦被人稱之為戴高樂大計劃。戴氏主張由法國聯合西德成爲軸心，然後把握歐洲共同市場，逐漸造成西歐(英國除外)的政治聯合，同時法國加緊發展核子武力，建立單獨的核子武力體系，以擺脫美國核子雨傘的保護，而造成其第三勢力。可見戴高樂的大計劃與甘迺迪大計劃，恰恰是針鋒相對，背道而馳的企圖。

戴高樂爲達成其第三勢力的夢想，在一九六三年一月，曾一連串製造若干驚人的表演：(一)戴氏以閃電式與西德艾德諾簽訂「法德同盟條約」；(二)戴氏正式否決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三)戴氏正式拒絕參加美國所提北約共同核子武力的計劃。由於戴高樂採取上述三項行動，使甘迺迪大計劃立刻破產，而美、法關係亦立刻進入空前的低潮，美國朝野人士莫不氣憤填膺，認爲此係美國外交上的莫大失敗，而對於戴高樂之忘恩負義，則一致加以譴責。甘迺迪爲挽救其大計劃起見，曾設法孤立戴高樂，同時又曾親訪法國以外之歐洲若干國家，但結果並未能如願以償，因爲事實上，此時之整個國際局勢已非古巴事件以前可比也。

由於東西雙方內部之分裂，美國深感對外政策理宜重加調整，因而產生甘迺迪的「和平戰略」的新觀念，是年六月，甘迺迪在美利堅大學畢業典禮中，發表演說，題爲「和平戰略」，其要旨有二：(一)表示美蘇有和解的可能；(二)警告法國，美國可能自歐洲撤軍。其結果則爲是年七月間，美、英、蘇三國簽定了「局部禁試核子條約」。此項條約之主旨，不但表示美、蘇已有和解的可能，且欲藉國際輿論制止法國與共匪單獨發展核子武器之企圖。所以美、英、蘇要求全世界各國予以加簽，以造成國際壓力，而制止匪、法進行核子試爆之冒險，孰知匪、法皆斷然拒絕加簽，置之不理，同時更加緊從事於核子之發展，於是弄巧成拙，誠始料之所不及也。(下期續完)

美國的和解政策之研析

李鍾桂

一 前言

自從一九五二年十月美國試爆第一個氫彈，一九五三年八月蘇俄試爆第一個氫彈成功之後，美蘇相繼競試，造成了核子武器的迅速發展，也增加了國際情勢的緊張與危急。美俄既均擁有可能互相毀滅，也可以毀滅全體人類的武器，由於它們思想與利益上深遠的差異，所發生的歧見與衝突，如不能及早緩和與消除，很可能把世界帶向末日。

在這核子時代中，最重大的國際問題，莫過於美蘇兩強之間，如何解決他們的政治與軍事競爭的難題。同時人類浩劫的避免也就寄托在美蘇的和平關係。誠如二十多年前艾森豪總統所說：「和平已無其他途徑可循。」^①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尼克森總統登台時，就強調「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一個和平接替戰爭的年代；也是一個談判取代對抗的年代。」爲了達成和平的願望，必須靠談判來實現。因此「和解政策」即在尼克森總統及其助

手季辛吉的努力推動下，成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一項最時髦與流行的名詞與策略。雖然和解政策亦曾一度獲得具體成效，但結果導致世局的混亂，美國的失敗。美國福特總統似已恍然大悟，於今年三月一日正式對電視新聞記者宣布，美國不再使用和解一詞，重申要以「經由實力達成和平的政策」，使「和解政策」壽終正寢。

在這七年推動和解政策的歲月中，究竟和解的意義與作用如何？和解政策的成效與代價如何？今後美國要憑藉什麼力量與方式，來達到維護世界和平與確保國際安全的願望，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與了解。

二 和解的意義

「和解」簡單地說，就是鬆弛緊張的局面，緩和緊張的情勢，也就是因爲思想、觀念、制度、主義的不同而引起的爭端、衝突，能在會議桌上，心平氣和地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稱之爲和解。從其意義可見，和解是人